

學林漫錄

八集



学林漫录
八集

中华书局

封面题签 许姬传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集 八

学 林 漫 录
八 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8 1/8印张·191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11501—14500册 定价: 12.00元

ISBN 7-101-01738-X/I·291

目 录

(171) 中 楚 辞	 戴 舒《书长半楚京京》
(171) 卧 平 俞	 李《五六坐卧》本新燕
(871) 陈 永 飞	 魏《休封藤萃百金》二尊米
(181) 游 骛 庭 童 书	 魏《休封藤萃百金》二尊米
(182) 游 骛 庭 童 书	 魏《休封藤萃百金》二尊米
“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	 魏《休封藤萃百金》二尊米
——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	 许 寅 (1)
王国维和“广仓学窘”及其他	 魏《休封藤萃百金》二尊米
——观堂遗事片断	 陈鸿祥 (19)
师门忆语	 刘 贻 遗 稿 (34)
忆黄季刚老师	 程千帆 (38)
洪煊莲先生和引得编纂处	 王 鍾 翰 (52)
逝水飞尘二十年	 李 影 画 塑
——忆聂崇岐先生	 段昌同 (69)
怀念刘盼遂先生	 聂 石 樵 邓 魁 英 (77)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吴小如 (88)
《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	 卞孝萱 (112)
唐诗地名“临洮”辨正	 刘 满 (122)
文天祥、谢翱诗拾遗	 栾 贵 明 (134)
略论词的起结	 唐圭璋 (138)
李清照里籍考	 褚斌杰 孙崇恩 荣 斌 (143)
说辛弃疾卒前三、四年中的情绪波动	 赵 偏 生 (149)
纳兰性德的《侧帽词》	 李一氓 (154)
读古代诗书画论札记	 启 真 (157)
谈谈刘熙载的《游艺约言》	 董洪利 (163)

《东京梦华录注》拾遗	程毅中 (171)
德译本《浮生六记》序	俞平伯 (177)
张敦仁《金石萃编校补》跋	罗尔纲 (178)
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	张重威遗稿 (181)
关于所谓“赵高复辟”问题的旧案	曹道衡 (185)
从万娘坟说起	牟小东 (189)
烛龙和北极光	张明华 (196)
木棉辨	杜婉言 (201)
万国衣冠自西来	——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在华的文化活动
向仍旦 (205)	
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	黄时鉴 (216)
日本学者研究六朝文学的新收获	孙昌武 (221)
壁画漫笔	潘絮兹 (229)
唐寅二题	陈振濂 (234)
《柳如是别传》匡失四例	周采泉 (239)
敝帚小识	郑逸梅 (244)

“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

——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

许寅

大概因为记者是湖州人的缘故吧,《学林漫录》杂志要我写一篇比较详细地介绍浙江湖州南浔镇嘉业堂藏书楼的文章。恰巧嘉业堂藏书楼的创办人、鲁迅笔下的“傻公子”刘承干的嫡长子刘诩万同志现在上海,又是记者的密友,于是就“先近后远”,首先在上海访问了刘诩万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家瑛女士——李鸿章的侄曾孙女。刘家过去是上海有名的大房地产商。解放以后,刘诩万除了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公私合营之外,还把宽大的住房交给了国家,自己搬进了一套大公寓;后来又由于国家需要让出大公寓搬进小公寓;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冲”又被“冲”到今天这间只有十个平方米的“小楼一角”。就在这只有一面天井窗的房间里,他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一提到嘉业堂藏书楼,刘诩万先向记者致歉:“先父创建藏书楼时,我年纪尚小,知之不多。如果你要了解详情,我倒可以介绍一位前辈老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周子美副教授。他老人家也是南浔人,同我家世交,博学多才,是先父创办藏书楼的主要助手之一。一九二五年藏书楼建成之后,他老人家即受先父的委托,任书楼编目主任,直到一九三二年应圣约翰大学之聘,来到上海执教为止,主管书楼事务达八年之久;所以欲知书楼详情,最好请教周老先

生，再加上我本人的回忆，两相印证，才能可靠。”

根据他的意见，记者又访问了周子美副教授。在访问之前，又特地提了几个书面问题，请他解答。如果不是刘沂万事先介绍，粗粗一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位老人，已是八十七高龄。你看他：须发虽已苍然，额上皱纹密布，但双目炯炯有神；尤其是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不过双耳重听，谈天颇觉费力，主要依靠笔谈。老教授不仅非常高兴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且详尽地作了书面答复，临别又一再叮咛：“有问题，以后再来。”把他老人家提供的材料和刘沂万本人的回忆，互相补充、印证，记者先勾出了刘承干先生创办嘉业堂藏书楼历史的“轮廓”：

一把尺“量”出一个嘉业堂

湖州南浔镇，清末以来，名满全国，可以说是全国县以下行政单位的“首富”。早在清末民初，就有“四象、八牛、十六条小黄狗”（有的更说是“四象、十六牛、七十二条小黄狗”）之说。所谓“四象”，指的是当时家财在一千万两银子以上的张（即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家）、刘（即刘承干家）、庞（庞莱臣家）、顾（即顾家；一说去“顾”存“邢”）四大“豪富”；“八牛”，指的是家财在百万两以上的八“大富”；“十六条小黄狗”，指的是家财在十万两以上的“小富”；至于十万以下，在南浔说来便“不入流品”了。

区区弹丸之地，何以巨富如此之多？归根结底，湖州盛产蚕丝是主要原因。自古以来，湖州一地，水土特别适宜蚕桑。无论产量、质量，长期为世界之冠。五口通商之后，蚕丝出口大盛。恰恰南浔又是湖丝主要集散地，所以经营丝绸出口业务者甚多，且颇易致富。张、刘、庞、顾四大家，全都是丝商发迹，便是明证。这四家中，刘家更是典型。

刘氏祖先原籍浙江上虞，于清代雍正年间迁居南浔。刘承干

祖父刘镛(字贯经,道光年间出生)青年时代家道还很贫困。刘镛十三四岁便至一家布店当学徒,先做勤杂,后站柜台,开始与“一把尺”打上了交道。因为精明能干,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点资本,即自立门户。后来看到经营湖丝大有前途,便舍“布”就“丝”,经营丝业。不几年,大发财,成了豪富。此人有一大特点:重“士”轻“商”。尽管自己靠“一把尺”量出了偌大家业,却始终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读书做官,光耀门庭。他的长子紫回(安澜)精通诗词,对于清代诗词兴趣尤浓,曾经亲自编辑“国朝诗萃”,未成而卒。刘镛即以次子锦藻之子承干承继于长房,成为“承重孙”。锦藻不负父望,用功勤读,不靠捐班,于光绪年间,先中戊子科举人,再中甲午科进士,后来还编写了清《皇朝续文献通考》、《坚匏盒集》,成为著名的学者。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在父亲的教育下,也是自幼读书,中过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办立学堂,他就没有机会再上进,而是潜心学术,著书立说,对于清代掌故,颇有研究。著作有三:《再续清代碑传录》,稿本已归中华书局,至今未出版。《清遗民录》,稿本在其老友严某家中。最有价值的是《历代词人考略》,委托著名词家况周颐代撰。系采用词话形式,约五六十卷,内容非常丰富,稿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唐圭璋教授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比《历代诗余》所附《词人姓氏录》还要详细,颇有参考价值。

一八九九年刘镛逝世,刘承干便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长房的财产,一夜之间顿成豪富。有了这份家业,自可不事生业,坐吃一世。辛亥革命以前,刘承干一家都住在南浔刘氏大院里,辛亥革命以后,迁居上海。直到一九六三年病逝(八十二岁),五十年间,除了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这三年,曾经住在苏州之外,始终住在上海。妻妾多人,一共生了六个儿子,没有一个闺女。长子世炽(庶出),已故。次子世煦(沂万,嫡出),五子世炎(嫡出),六子世烜

(庶出)，均在上海。还有三子世烈(庶出)，四十多年前去德国；四子世燁(庶出)，解放前移居台湾；目前均下落不明。刘沂万因系嫡长子，从一九一四年出生到一九三四年，一直住在父亲身边，所以对嘉业堂藏书楼及刘承干本人的情况，虽不尽详，耳濡目染，也知之不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考入圣约翰大学以后，专业虽系西洋文学，本人所好却是中国古典文学，更酷爱戏曲，又直接受周子美副教授熏陶，所以对藏书楼也颇有感情。

“嘉业堂”三字的由来

一九一四年，刘承干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麦特赫脱路(现泰兴路)西边，造了一所住宅(即今天北京西路小学所在地)，一九一五年举家迁入。据刘沂万告诉记者：自己从小识字，最早认得的便是“嘉业堂”三个大字。因为这座房子正厅中央就挂着一块大匾，匾上就是这三个擘窠大字。这三个字是状元陆润庠的手笔。堂名取“嘉业”二字，直接来源于溥仪赐给刘氏的匾额——“钦若嘉业”。而这四个字最早却见诸于西岳华山的一块庙碑，不知有何典故？这一说估计可靠，因为陆润庠是溥仪的启蒙老师。为什么末代皇帝对刘家有这种厚恩呢？主要因为刘承干曾经捐助巨资修建光绪皇帝的陵墓。辛亥革命以后，刘承干又喜欢结交有学问的遗老遗少，通过他们，同这个当时已蛰居故宫、号令不出神武门的“小朝廷”也拉上了关系，还贡献了不少钱给末代皇帝。有了钱，不去交通当今权贵，却去孝敬“逊位皇帝”，可见“傻公子”对“功名”二字确乎“傻”得有趣。

讲完这些旧事，刘沂万同志还告诉记者：“先父官瘾很大，但一生之中，既从来没有做过官，也不会做生意，只知道花钱，不知道赚钱，只是托祖宗福泽，安富尊荣，本人从未显赫。逝世之后，由我书写墓碑，有人建议写‘显考’二字，我说：小小一个秀才，何‘显’之

有？只写了个‘先考’。”这是件小事，却反映了两代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故录之以供后人研究刘氏家史者参考。

兴建藏书楼始末

前面已经提到刘镛发迹以后竭力鼓励子孙读书仕进。刘锦藻更成为进士、学者，一生沉浸于书堆里。刘承干幼承家学，很早考中秀才，国学基础相当深。虽因清廷废除科举，无法继续举业；然而既居豪富之家，本人无需操劳生计，就可以浸淫嗜好——而他的第一嗜好，便是读书，买书，藏书，校书，写书。他有计划地买书，开始于清末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起初他买书有两个目的：一是想继承生父刘锦藻编著《续文献通考》的事业，所以大量收购史部书。二是想继承继父刘安澜编辑清朝《诗萃》的事业，所以又大买清人集部。逐年积累，愈聚愈多。愈多则眼界愈宽，兴趣愈浓，嗜好愈甚，欲望愈高。而且，手握巨资，肯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因此，闻风者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几有海涵万家之势”。这就恰恰应了《战国策·燕策》所载郭隗对燕王所讲的寓言：古人欲求千里马，故意花五百金买一死马而归，风闻各地，“于是不期年千里马之至者三”。因此，积十年之久花费近三十万元，刘承干手里已经有了不少珍贵古籍，上海家里几乎堆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想到了这一个豪举：利用南浔刘氏家园，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遥遥相对。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傻公子”既动此“傻”兴，肯花“傻”钱，稍经酝酿，这个藏书楼便在一九二〇年破土动工。历时五年，终于落成。兴建时并未请专家擘划，只是按照旧式厅堂建筑，依样画葫芦而已。

藏书楼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广告，再加上刘承干素来手阔，所以在藏书楼建设过程中，卖书者已接踵而至，楼建成，

他也大手大脚，不惜巨资，大量征集。例如江南著名收藏家甬东卢氏之抱经楼，独山莫氏之影山草堂，仁和（杭州）朱氏之结一庐，丰顺丁氏之持静斋，太仓缪氏之东仓书库，他都是“照单全收”，出高价全部买下。与此同时，各地书商和遗老遗少闻风而至者，更不计其数。据刘沂万同志回忆，当时常来的书商，著名的有北方人李紫东，苏州人柳蓉邨，扬州人钱长美，杭州人朱某（此人解放后仍在陕西路经营秀州书店，曾面告沂万当年学徒时随其师至嘉业堂卖书的情况）等等。仅从上述几个书商的来历，就可知道嘉业堂藏书的主要来源在于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这些地方正是文物荟萃之所，民间收藏最为殷实，所以藏书楼建成前后，大量古籍涌集刘家。到藏书楼建成，全部藏书增加到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十六七万册。其中有宋元两代精槧一百四十九部（完整的有一百零六部），珍贵的孤本《永乐大典》四十二巨册，翁覃溪手纂《四库全书提要》原稿一百五十册，等等。但是，刘承干藏书还有两大特点：一、不专门注重宋元槧本，而更著眼于明清两代。当时“明清两朝诗文集，几乎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所以他收藏的明清槧本特多：前者有二千种左右，后者更多达五千种上下，此外还有抄本近二千种。二、不惜重金，广收各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一直到镇志，来者不拒，共收一千二百余种（复本不计），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其中可称“海内秘籍”的珍本，即有六十二种。这两大特色，不要说一般藏书家无法比拟，就是宁波天一阁也瞠乎其后。

除了买书，刘承干还聘请专人在一些图书馆和藏书家那里抄书。最为巨观的是《清实录》、《清史列传》这两部底稿，其时由国史馆保存，外面不要说刻印本，连抄本也没有。刘承干竟出资两三万元，由专人在北京国史馆内，花数年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回来；可见其藏书瘾头之大、“傻劲”之足为何如！

然而，当时最被人笑为“傻事”的，是这位“傻公子”不光花“傻

钱”买书抄书，而且买来之后，即使孤本，也从不自秘，而是拣有价值者刻板印刷，广为流传。或者任人抄写，以至流传海外。据周、刘二位回忆，只要名人介绍，国内外都可以来藏书楼看书，抄书，很少遭到拒绝。例如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就来抄过《明实录》；一位湖北人姓徐名行可的，为了抄书，在楼中一住数月，连膳宿都由藏书楼免费供应；有几位日本汉学家还来信委托藏书楼请人代抄一部分《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照样得到满足。不单允许抄，而且还答应人家免费借去翻印。例如商务印书馆通过张元济借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便是其中之一。

要了解刘承干刻书印书严肃认真到什么程度，看看他的刻印过程就清楚了：每决定刻印某一种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专家推荐以后，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例如《章氏遗书》，便是由著名史学家沈曾植推荐，《希古楼金石丛书》便是请著名金石家褚德彝校订。除此之外，大名鼎鼎的吴昌硕、王国维、郑孝胥、况周颐、朱古微、张元济、罗振玉、缪荃荪、叶昌炽等人，都曾经为刘氏刻书印书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在选定、校订结束之后，再请专家作跋，说明所刻书籍来龙去脉及其价值。然后交给书铺刻印。有些精本则请一位最善于摹写各类字体的湖北人饶星舫，摹写纸上，再交给刻工精细著名的陶某（佚其名，也是湖北人）刻在木板上，经过仔细校对再行印刷。当时为刘氏刻书印书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印刷铺，例如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等。不论印刷装订，也务必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这样印出来的书，自然质量很高了。

此公还“傻”得有趣的是，刻印的书，大部免费送人，甚至大量大量地送，只有少数出售。为了送书送得道地，“傻公子”一度专门雇一个人负责送书事宜，这个人姓邹，名履冰。他的任务，便是把印好的书，保存在嘉业堂东面旧洋房的一间大房间里。逢到有人

来讨，也由他负责邮寄，连邮费也是白贴。不但国内著名的图书馆、学者、名流、要人，来函即送；便是外国的图书馆或学者来要，也照样奉送。来讨得最多的是日本人。——这好象是件“傻事”，后来却得到了善报：抗战初期，南浔沦陷，日寇烧掠严重，十室九空，唯独藏书楼和刘氏家园得以保全，纹丝不动。其故安在？据说日本有一著名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多次来信向嘉业堂讨书，刘承干总是有求必应。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起，他的妻舅“牧少将”出发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南浔，务必要保护嘉业堂及其藏书楼。事有凑巧，这个“牧少将”后来果然成为这一带的日军司令官，便命令部下保护，自己还亲到藏书楼察看。这岂不是一段趣闻？（另有一说：侵入南浔日军，进入藏书楼，看到溥仪所赐匾额，所以加以保护。据分析，此说不可靠。日本侵略军向来视满洲国为附庸，溥仪为傀儡，岂有买他账之理！）不过藏书楼藏书，抗战八年间所以未受损失，除了这个传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书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因此战火一起，他便托人到南浔，一面将大量珍本送到上海租界家宅，一面从无法运出的整部书籍中抽走第一册，隐藏在私宅天花板内（解放后交出）。这样，等到日寇占领南浔，曾几次派人前来察看，却认为珍贵者不多，所以未曾下手。不过这些都是传说，并无确证。

在谈到刘承干送书和这个传说的时候，记者曾请问刘沂万同志：既然嘉业堂广泛送书，何以鲁迅先生于上海两次登门（爱文义路刘宅）求购而不得（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他笑道：迅翁太认真，以其大名，只要一封短简，先父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而遭到白眼，这也是一种“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无可奈何之事也。

刻书、印书、送书之外，“傻公子”还做过一件大好事：请声誉卓著的学者编书、写书，最突出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请况周颐编的《历代词人考略》之外，还有辽阳杨鍾羲（字子勤）和庐江陈诗（字子言）

编的《国朝诗萃》(未完成),仪征刘富曾(字谦甫)编的《宋会要》等等。

最后,记者又请教周、刘二位:刘承干兴建这座藏书楼,到底花了多少钱?周子美副教授答道:“我曾经问过刘承干本人,他说建造书楼花了十二万元,购买书籍花了三十多万元,刻书印书花了二十多万元,再加上聘请人员编书、校书、抄书、鉴定等等,共花约十万元;总共约花了八十万元!”在二十年代,这个数字,对一个私人来说,可算得上“天文数字”了,可见“傻公子”确乎“傻”得可爱。

花了这八十万元,一共藏了多少书呢?周、刘二位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择要而言,有宋本、元本二百种,明本二千种,清本五千种,方志一千二百种,抄本二千种,其它一千到二千种;共一万二三千种,十六七万册,六十万卷,包括不少海内孤本。此外还有碑帖数千种。平装洋装书也有,但数量不多。

那末又印了多少书呢?据周、刘二位回忆,主要的有这几种:《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以及单行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斟注》、《章氏遗书》、《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书板有三万至四万块之多。其中以史部为最。所刻四史全系红梨木精雕大字本,价格每部高达三百元,珍贵难得,极为学人称誉。还刻了不少清代的禁书,例如屈大均《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闲鱼闲录》,李清《三垣笔记》等!这一点鲁迅先生特别欣赏,所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赞:“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读者就可以看出这个“傻公子”为祖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傻贡献”有多大了。

记者还专门请周子美副教授介绍了他本人同藏书楼的关系,

他告诉记者：他于1913年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经济科。因同刘家是世交，一九二五年藏书楼建成，便应邀担任编目主任（也就是负责人）。直到一九三二年为止，连续任职八年。这八年也正是藏书楼的全盛时代。当时全楼共有职员四人，工人四人。职员除他本人，还有三人：一位刻字工，兼会计庶务，姓王，名建夫，他一个人就刻了一千多只书箱上的字。一位编目助理，姓施，名韵秋，江苏海门人，海门中学毕业，做过十几年小学教员，到藏书楼以后，还在南浔中学兼任教员，此人精通佛学，长年茹素。一位职员，姓刘，名君实，是刘承干堂弟，专管在书上盖图章，点卷数。四位工人：一位传达，一位厨师，一位杂役，一位园丁。当时物价便宜，工资很低，编目主任月薪三十元，其余职员工人不到三十元。每年经费约三千元，全部由刘氏一人支付。藏书楼建立以后，从未向政府登记立案，纯属私人性质。

周子美教授还告诉记者：本人原学政治经济，对于图书馆业务，全系到藏书楼以后“现学现卖”。刘承干在建造藏书楼以前曾请缪筱珊编过一部《藏书志》（有人说并非缪本人亲笔，而是他儿子代笔），记述他藏书情况。一九一九年缪氏逝世，后又请董授经（名康）续编，但时间极短，所以《藏书志》始终未成。经过多年努力，周子美和他的同事，曾经编了十二本藏书目录，每种只抄三份，现已全部遗失。印出的目录有两本：一是《善本书影》，记录宋元两代珍本；二是《善本书目》，记录明代刻本。至于大量清代版本，就没有来得及编著详细目录。

当记者请周子美副教授对刘承干的藏书事业给予一个总的评价的时候，他用几句话加以概括：“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以及湖州地区的其他藏书家（蒋氏密韵楼，张氏适园，王

氏治庄楼)。至于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为以上诸家所望尘莫及。称其为清代以来私人藏书家的巨擘，毫不过分。”^①王，著并次志意韵人

在谈到嘉业堂藏书楼的变迁的时候，周子美同志慨乎言之：刘氏兴建藏书楼之初，也曾经立下宏誓大愿：“余之为是楼，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所以要把它造在自己的家庙旁边，也就是想“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他还向子孙发出过这样的呼吁：“庶哉！继昆山、新城、秀水之盛，吾刘氏子孙其世守勿替乎！”也就是说，原来他是极其希望自己亲手创办的这个藏书楼能够避免历代藏书家“终归流散”的规律，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藏书楼建成以后，全盛时代仅仅十年而已。抗日战争之前，已经由于家道中落，开支浩繁，“傻公子”又不善蓄积，因此将大量珍贵书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宋刊《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鹤山集》、《寥反联珠集》等，售与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稿本，售与北京图书馆；手抄全部《明实录》，售与中央研究院（在此之前，此书曾由南京国学图书馆抄去一部。后来汪伪政府曾经影印传世）；《永乐大典》售与大连满铁图书馆（现存北京图书馆）。抗日战争之后，藏书楼全部工作陷于停顿，他曾设法运出善本数万册。其中明刊本一千三百多种、抄本三十多种，经郑振铎、徐森玉介绍，以二十五万元秘密卖与重庆中央图书馆（专门派人来沪洽购、启运），这批书现在台湾。此后，又将四百多种明刊本卖与张叔平（后来，张氏将它们让与浙江大学图书馆，院系调整后，归杭州大学图书馆）。解放以后，又通过吴县王欣夫教授介绍，卖了二千种左右给复旦大学图书馆，仅收费数千元，属半捐半卖性质（这批书，复旦图书馆印过目录。）其他零星售出的自然也不在少数，不过详细情况，由于刘氏本人及当时的藏书楼负责人施韵秋俱已逝世，已无法知道了。^②周子美，著并次志意韵人

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刘氏虽希望“子孙世守勿替”，实际

上许多珍本在他手里，仅仅保存了一二十年而已。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一个私人藏书家，想“世守勿替”，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嘉业堂藏书楼现状

在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刘承干创办嘉业堂藏书楼的历史以后，记者又特于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两访南浔：第一次与参加湖州书画院成立大会的书画家同往，作了一次“走马看花”式的“巡礼”；第二次，则在藏书楼住了一天，“下马看花”，耳闻目睹，知之较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记者与爱新觉罗·溥僊先生以及《人民日报》记者袁鹰、《民主与法制》主编丁柯、《浙江日报》记者倪元泰等同志，一起从湖州来到南浔。这个古镇，沿水筑街，到处小桥流水，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而且，从五十年代开始，便是全国的卫生模范。毛泽东同志曾经亲自为一条报道南浔卫生工作的新闻做了一个特别醒目的标题《万人大镇无苍蝇》，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尽管经过十年动乱，卫生水平已经下降，但是比起大多数城镇来，还是干净得多。一进镇内，不论大街小巷，基本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上去非常舒服。沿河边小街前行，过镇人民政府约二百米，向右转出一条小巷，再穿过一片农田，向左跨过一座小石桥，就到了原来的刘家花园小莲庄。

小莲庄这个名字是从赵孟頫莲花庄那里借来的，现在已经对外接待游客，负责人是一位姓张的女同志，还有几个工作人员，态度都十分亲切。他们首先引导我们在这个小花园里游览一周。这个花园小虽小，建筑却相当精致，共分内外两部分。我们一行先游外园，一脚踏入，豁然开朗，劈面便是一个广约十亩的荷花池，名挂瓢湖。此名带有浓厚的出家人色彩。据说原来湖边有一古庙，名